

现代性幸福叙事批评家：从韦伯、涂尔干到塞内特

邢立军 马妮

[摘要] 幸福叙事是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特征。幸福叙事肯定了人类历史进步论，并肯定了社会进步与幸福增长的并行关系。以韦伯、涂尔干和塞内特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以冷峻的眼光审视了现代性对人类幸福的消极影响。他们的理论澄清了现代性与人类幸福之间的复杂关系。今天，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社会问题，正确的态度不是彻底否定现代性，而是思考对策和出路，进一步推进现代性并续写现代性幸福叙事。

[关键词] 韦伯 涂尔干 塞内特 现代性 幸福叙事 幸福

[中图分类号] C91-06; B82-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3) 10-0026-05

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预设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过程，并肯定了人类将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日益幸福的必然性。卢梭是现代性幸福梦幻的第一个“梦醒者”，他谴责现代社会徒具浅薄的欺骗性外表，崇尚荣誉，却丢弃了美德；推崇理性，却毫无智慧；追求快乐，却遗忘了幸福。卢梭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还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但历史的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卢梭对现代性忧思的前瞻性。两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完全是幸福的进步故事，甚至在物质已经高度发达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一方面享受着物质丰饶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心灵上饱受煎熬。直至今日，一直有思想家对现代性缘何未能兑现幸福诺言进行思考，他们对现代性究竟在社会结构上带来了何种后果，这种后果又如何使现代性与幸福“失约”做了深入研究，韦伯、涂尔干、塞内特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思考与卢梭的现代性批判具有明显差别：卢梭的批判更多地体现着浪漫主义和破坏性，而他们的批判则更多地体现着理性主义和建设性，更清楚地映现了现代性与幸福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韦伯：禁欲的今生与幸福的幻影

虽然韦伯并没有把“现代性”一词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人类历史的解析，但是，他的合理化、官僚制等概念却早已被公认为把握现代性实质的理论范畴。当代韦伯研究专家施路赫特评价道：“韦伯的论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状况的诊断，而在他的诊断中，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认为我们终会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人类幸福的信仰。今天，似乎逃避现世与适应现世的心态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环不已，韦伯的这番诊断因此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他的诊断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以不愉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不舒适、不痛快却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1] 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冷静分析，使他成为现代性幸福叙事一位重要的批评家。

作者简介 邢立军，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广东 深圳，518060）；马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吉林 长春，130033）。

韦伯对理性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是透彻而全面的。在他看来，现代性的功过是非都与被理性计算所渗透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化”以及作为生产与社会的组织形式的“官僚制”息息相关。“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把人变成了纯粹的生产工具，为了配合经济目的的实现，人化身为在生产的节奏之中屈辱地扭曲、收缩与伸延的“变形虫”；作为合理化社会生产的实现途径和制度保证，官僚制构筑了囚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铁笼”。在一个全然官僚制下的社会，人本身已经工具化了，人本身所承载的本质和价值已经被淹没在物质利益的海洋之中，幸福已经成为泡影。官僚制和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之所以成为现实，其深层原因在于新教伦理在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上所造成的扭转。在一定程度上，新教伦理所蕴含的价值规范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思想的倒退。作为现代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文艺复兴运动所开启的人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强调人不再是神的附庸和傀儡，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当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设计和实现自己的时候，幸福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文艺复兴所标志的幸福观的转变并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过程，人类的幸福追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笼罩在宗教的阴影之下。宗教改革与新教的兴起并不代表着上帝把人的幸福的主动权交还给人自身，而是进一步把主宰人类幸福的权力收紧了。新教把判断人是否最终得救的“解释权”牢牢抓在手中：人生的目的在于得到上帝的恩宠和死后得救；但今生的闪耀业绩并不表明上帝的恩宠，因为上帝早已事先决定了谁终将得到垂青。人虽然看似取得了设计和谋划生活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今生的及时行乐，而是以禁欲和隐忍的态度生活和劳动。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成为了劳动的机器，他刻苦劳作，创造和集聚着财富，却不肯把财富用之于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短暂抚慰。这种禁欲不仅是自虐的，还是自我欺骗的，因为禁欲并不会消除欲望，只是把欲望接替性无限延后。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总是用不远前方欲望的满足为诱饵来骗取自己进一步的坚持和忍耐，而事实上这种满足却从来不会兑现：当自我已完成了禁欲的额度并抵达了享受满足的站点时，他就会把诱饵再度前移来牵引自己做同样的行程。一旦自我不慎“软弱”地沉入幸福的陷阱，巨大的内疚感与负罪感将成为自我的心灵重负，为了惩罚和警戒自我，他会为自己设定更高的门槛和更加苛刻的目标，用对自我的惩罚来换取心灵的安静与平复。

这种把幸福无限延后的禁欲主义体现了现代性和理性本身的矛盾性。理性应该服务于人本身，它应该把人类的幸福作为自身的目的，理性应该成为幸福自我成就的工具。然而，在现代社会，结果却恰恰相反。理性的自我谋划和自我安排恰恰是一种非理性。在这里，理性与宗教二者互为“推手”：它们联手造就了现代社会中不快乐的人群。这是一群在合理化、官僚制和新教伦理的禁欲和自虐精神驱使下的整日惴惴不安的人，他们的愁苦面容是现代性对于人类幸福生活负面影响的真实写照。

二、涂尔干：病态的失范与绝望的自杀

同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一样，涂尔干的研究指向，也是探求把混乱而动荡的社会引向安定和秩序、把人民从痛苦和迷乱引向安定和幸福的途径。同孔德一样，涂尔干也认为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的根由，在于两种社会类型之间的转变。在孔德看来，他所属的时代法国乃至欧洲人们的困苦来自于社会从“神学和军事的社会制度”的时代向“科学和工业的时代”转型之间冲突的爆发和矛盾的激化。在涂尔干看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即从“机械团结”的社会向“有机团结”的社会的转变，意味着构成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的要件——“团结”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建立在劳动分工和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由于传统的集体思想意识和价值规范的削弱，陷入“失范”（anomie）状态，这是造成人们的痛苦乃至自杀的重要原因。

涂尔干认为，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的集体意识，是社会稳定有序的前提和保证。他把劳动分工看成是社会结构转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认为，传统社会的整合方式是“机械团结”——人与人之间的“机械”关联把他们连接成社会。随着“社会量”、“社会物质密度”和“社会精神密度”的增加，建立于紧密的机械团结基础上的传统社会开始了分化。在劳动分工和个体自由意识的基础上，现代社会的整合方式变为“有机团结”，即以个体之间由于分工差别而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式。在

“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传统社会那种把人们连成一体的共同思想意识已经解体，社会面临着重构共同的道德、宗教和法律等集体意识系统的任务。在统摄社会全体的共同思想意识没有建立之前，社会就会陷入失范状态，即由于道德、法律等集体意识系统缺乏有效的对社会生活系统的调节与控制所造成的社会冲突与混乱局面。失范是社会一体性的消散，是社会陷入病态的表现。涂尔干这样描述失范社会的碎片化景象：“第一个例子就是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它们足以使有机团结发生断裂。实际上，它们已经证明，在有机体的某些方面，某些社会功能相互之间是无法调和的……同一现象的另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就是劳资冲突。工业职能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面发展，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就越激烈，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发展水平……第三个例子是科学被分割成为许多狭窄的研究领域，彼此毫无联系，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了。”^[2]当然，失范的现代社会并不意味着共同意识的完全消除。事实上，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着与传统社会的集体意识地位相当的东西，如共同的信仰和道德准则。如果这些共同的东西过分缩减甚至荡然无存了，那么，社会就真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

涂尔干虽然在总体上赞同劳动分工，认为这意味着传统专制权力的衰退、理性的日益增长以及个人创造性的提高，认为这将对社会进步产生有益影响并导致人类幸福的实现，但他并不认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是如影随形的。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失范是一种社会病态现象，它会导致社会的分裂、人们的暴力化和日益增加的自杀倾向。涂尔干对当时欧洲社会的自杀现象的增多深有感触。他认为，不断增加的自杀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幸福并不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而增长。“工业危机或金融危机之所以使自杀人数增加，并非由于这些危机使人贫困，因为繁荣的机遇也产生同样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危机打乱了集体秩序。对平衡的任何破坏，哪怕由此而导致更大的富裕和生活的普遍提高，也会引起自杀。每当社会机体发生重大调整时，不管是由于迅速的发展还是由于意外的灾难，人都容易自杀。”^[3]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的人之所以感到不幸福甚至自杀，是因为他们沉湎于无止境的欲望，总是试图获得更多的东西，结果总是以失望收场；要制约这些膨胀的欲望，必须借助于理性、权威、值得敬畏的集体意识和精神力量。这说明，自杀率的上升并不是社会经济的进步能够消除的。既然失范及其病态症状的根本原因在于把松散的人群胶合成社会整体的集体意识的削弱和消散，那么思考在“有机团结”之下的现代社会把个人融入集体的途径，就成为消除失范及其危害的必然出路。在考察了家庭组织、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三种重新使个人和集体结为一体的途径，然后又分别否定了这三种方式之后，涂尔干给出了行会组织的途径。在他看来，行会组织符合经济活动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是培育现代人的集体思想意识和道德纪律观念，从而把社会从无序引向有序的最佳途径。

三、塞内特：流动的社会与斑驳的人格

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塞内特（Richard Sennett）的笔下，今日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已经一扫往日重复而单调的节奏，而把流动、变化和冒险作为其主旋律。诚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批评的，昔日资本主义刻板的劳动分工和乏味的生产节奏对工人的心灵和人格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流变而灵活的今日资本主义并没有对此做出扭转。“工人们被要求行动灵巧，迅速响应变化指令，不断地冒险，减少对规程和正式步骤的依赖性。”^[4]对工人而言，流动的资本主义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些要求绝不是福音，而是枷锁，它们意味着对工人人格的侵蚀和幸福权利的进一步剥夺。作为对刻板而冷酷的官僚制的反动，流动性的增强看似会减轻资本主义加在工人身上的压迫，看似会赋予工人更多的自由，会交还工人塑造自己生活和性格的主动权，而事实上，它远未废除资本主义的冷酷机制对工人身心的控制，而是把这种控制改头换面并隐秘化了。

塞内特概括了流动资本主义的三个典型特征：“机构的非连续性改造”、“流动的专业化”和“非中心化的集中”。现代生产管理理论的一个主要立场，就是强调松散结构相对于传统的金字塔形层级结构的优越性，因为松散结构更具灵活性，可以通过人员的调整和变动来迅速适应市场需求与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调整之所以是“非连续性改造”，是因为变动的结果常常使机构面目全非，使机构现在和以前

的连续性丧失了。裁员总是这种调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裁员的目的是出发点都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削减生产成本，然而，结果却并不乐观，只有“不到一半的公司达到了支出削减的目标，少于三分之一的公司增加了利润率，少于四分之一的公司提高了生产力”。^[5] 出现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并不意外，因为，裁员是对工人忠诚和积极性的巨大打击，而这绝不会提升躲过劫难的雇员的干劲和创造力。企业之所以明知这种结局却仍旧毅然决然地裁员，原因在于对机构进行扰动本身是有利可图的。机构的重组虽然本身不能提高生产力，但是，流动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变化总比不变要好，重组的机构会给投资者一种积极进取的印象，从而使其股票常常会在短期内升值。所以，重组的企业对投资者的回报常常是以对雇员的伤害为代价的：流动资本主义使雇员的劳动生涯在紧张气氛中度过，使他们沦为这种流动性的牺牲品。“‘流动的专业化’是以福特制为体现的生产体系的反题。”^[6] 为了与市场需求密切贴合，迅捷地调整生产，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必须拆解昔日漫长而笨重的装配线，而代之以轻便灵活的“岛式”装配单元。这种新型生产模式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它情愿把主动权交出来，让市场流变的需求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生产结构。为了保证企业在需求面前的流畅“变形”，“莱茵模式”和“盎格鲁—美国模式”应运而生了，两种模式下的工人都无奈地成为牺牲品。两种模式都没有成为工人幸福生活的乐园。“盎格鲁—美国模式”有着较低的失业率，但是，却造成了工资收入的巨大差异和贫富的巨大分化；“莱茵模式”以社会福利抵消了过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弊端，但是，却不能逃避高失业率的魔咒。两种模式都听命于“唯我”而“任性”的市场经济，以对工人肆意地“弯曲”和“拉伸”来换取灵活性。“非中心化的集中”是指在流动的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操作形式看似由旧式的中心集中式转向分散，然而，这种分散实则是一种新的集中——非中心化的集中。由于产品和任务的日益复杂化，外包、代工以及贴牌的普遍化，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似乎在一种松散的网状结构中展开，一项复杂的任务被不同的工作组承担，一件复杂的产品由不同的生产部门分别完成。不同的工作组与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络与协调、竞争与合作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这就表明保持旧式的中心集中式的权力运行机制不仅是低效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旧式的在聚光灯下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消失了，松散而隐秘的控制方式出现了，它是与今日的网状生产结构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权力对生产部门的控制是通过安排生产计划和盈利目标来进行的，每一个部分可以“自由”地决定完成这些目标的方式。可以想见，这些目标绝不是可以轻易完成的，它们常常不与实际的供需状况相协调，甚至是在部门的实际能力之外的“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权力中心的退隐绝不意味着宽松与自由。“在不平等经济学看来，这种新秩序向机构里面添加了新的非平等的、专断的权力形式。”^[7] 在体积庞大、机构复杂的现代企业中，中心化的权力虽然退隐到幕后，并日趋无形，但事实上却从未放松对人的钳制。

流动资本主义的所有这些结构性特征的最终受害者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人们在流动性的潮汐中随波飘荡，他们的时间感觉被一次次无情地斩断，他们的社会生活被流动性切割成碎片。“新资本主义的时间状况造成了人格与经验之间的冲突”，^[8] 在这种冲突之中，人格被侵蚀得“锈迹斑斑”。人们在流动资本主义变态时钟的驱策下艰苦地做着快速变节奏的奔跑，他们无法追求长久的目标，无法确立稳定的社会关系，无法形成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流动资本主义动摇着人们对永久、安全、意义、忠诚、身份、信念等积极价值的追寻，它带给人大量的短暂、不安、疏离、孤独、分裂等负面情感，这些消极因素本身就是对现代性幸福叙事的“抗议”。

四、现代性：未完成的方案与未完结的幸福叙事

现代性等同于社会进步与人类幸福，这是百科全书派给人的基本印象。作为启蒙思想的突出代表，百科全书派的理论著述中充满了对科学和理性的乐观肯定。他们坚信，以不断进步的理性为科学的和技术进步将扫除愚昧和迷信的阴霾，为人类社会的幸福和美好打下基础。但在他们满怀激情的理性赞歌之中，现代性消极而晦暗的一面被不经意地隐去了。百科全书派的这种立场事实上暴露了其理论的矛盾性：他们对现代性的盲目乐观本身就不是理性的态度，而正是由于缺乏理性的检视，在其视野之中，

现代性才环绕着一片祥和的幸福光晕。在他们之后，现代性开始不断经受着理性的考问，在这种考问之中，现代性与幸福的真实关系不断得到揭示，同时，社会理论的定义和真实功用也变得日益清晰。

与百科全书派对现代性的热情讴歌和卢梭对现代性满怀激愤的控诉相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了现代性本身。在基本方向上，马克思对现代性怀有相当的信心，相信生产与实践的历史逻辑将把人类引向美好与幸福的明天，因此，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马克思并没有沉浸在对现代性的简单迷恋之中，而是在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与具体的社会之中对其进行抽丝剥茧的细密分析。通过这种分析，马克思不但清楚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矛盾和人类将为之付出的代价，还指出了人类克服这种矛盾从而通往幸福彼岸的正确道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与现代性思想为社会理论提供了楷模。一方面，社会理论不仅应当包含着价值判断，还应当用价值判断表达人类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期冀；另一方面，社会理论又不应当停留于价值判断，而是应当以科学的态度真切地观察和剖析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在现实分析之中呈现价值判断的可能性与误区。在前者的意义上，社会理论是哲学性的，甚至是信仰性的，它借助于价值判断表达对社会现实的肯定与否定，以价值导向表述社会的应然模式和状态；在后者的意义上，社会理论成为社会科学，它试图把科学的逻辑性、条理性和严密性应用到对社会的科学研究，使社会的表层弊病和深层矛盾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科学理性的批判性面前显形。在前者的意义上，现代性社会理论必然要进行幸福叙事，要把社会历史书写为价值实现的征程；而在后者的意义上，社会理论又必须超越幸福叙事，把理论对现实的干预引向科学的道路。所以，社会理论应该体现价值维度和科学维度的统一。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社会理论范本的话，那么韦伯、涂尔干以及塞内特的社会理论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理论应有的抱负和志趣。他们的理论当然也蕴含对通过现代性来通达理想的社会形式和人类幸福真实状态的肯定，但他们没有不加质疑地复述现代性的幸福叙事，而是把现代性的抽象理念现实化为理性与官僚制、失范与自杀以及社会流动性等具体问题，使现代社会的这些问题与人类幸福之间的矛盾异常真实地显现出来。

韦伯、涂尔干和塞内特等人的社会理论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其反思性和批判性——不能仅停留于对现代性表面的阳光与美好的刻画和勾描，还要用深邃冷峻的目光凝视现代性内部的险滩和暗涌。这些现代性的批评家并不孤独，事实上，从卢梭、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到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应该看到，现代性社会理论的自我反思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解构是不同的。如果说现代性的批评家们的态度是“有褒有贬”和“喜忧参半”，那么后现代主义则试图从根本上粉碎所有现代性的信念与梦想。后现代主义的激进和不留余地不但使自己的动力很快燃烧殆尽，还激起思想界对现代性的成败与得失的再思考。哈贝马斯对那些悲观地对现代性感到绝望并匆忙地宣布现代性终结的态度感到忧虑。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他承认现代性方案随着种种错乱，但人们需要做的是从这些与现代性方案相伴生的错乱中去学习和总结，而不是轻率地放弃现代性和它的方案。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工程的精神内核是创新和求变，正是基于不断的推陈出新，现代社会才沿着崎岖的道路盘桓而上，才会不断地向道德的进步、社会体制的公正和人类的幸福靠拢。现代性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使命还远未终结，现代性的幸福叙事仍将继续。

[参考文献]

[1] [德] 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2] [法]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14-316页。

[3] [法]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65页。

[4][5][6][7][8] Richard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W.W.Norton, 1998, p.9, 50, 51, 55, 31.

责任编辑：罗 苹